

您的位置：比较政治研究网>实证分析

多元文化与当代欧洲政党的变革

作者：

常晶

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01期

多元文化与当代欧洲政党的变革

常晶

摘要：多元文化的现实给政党政治增添了复杂性，对政党的适应性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各国政党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回应，当代政党变革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在坚守政党旗帜与适应形势变化之间取得平衡。政党需要持更具包容性的政党纲领、实现从追求同质性到追求共同性的转变，通过协商、对话、吸纳、调和等来寻求最大程度的共识，才能既坚持旗帜又包容多样，才能保持活力得以存续与发展。

关键词：政党；多元文化；适应性；包容；共识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是在民族国家的结构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均以文化同质性社会与对共同体的一致认同为基础。J. S. 密尔早在19世纪就明确指出了多民族与代议制民主的冲突，他说，“在一个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国家，自由制度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缺乏共同感情，特别是语言不同的人民中，不可能存在实行代议制政府所必要的统一的舆论。”胡安·林茨也指出“在由多民族、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和多元文化社会组成的国家之中，人口越多，政治就越复杂，这是因为就民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将越困难。”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扩展，人口流动性与文化多样性不断增长，即便是原先以单一民族建国的国家，现在也不得不面临多样性的现实。

政党是民主政治中的重要行为单元，虽然政党政治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内容，政党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着政治生活。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存在政党，并且政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多元文化现实，具体到政治实践中，往往与政党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是西方先发展国家，还

是后发国家，面对一个无可回避的多元文化现实，政党适应性（Party Adaptation）问题非常值得思考，多元文化背景下对政党政治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多元文化给竞选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执政党如何回应多样性带来的种种挑战、政党转型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和趋向，本文将试图对此做出分析。

一、挑战：多元文化的现实

文化，指的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精神、行为、制度、物质四个层面；基于此，多元文化所囊括的内容很丰富，既包括不同族群的文化，也包括生活在同一社会、国家中持不同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群体，比如支持同性恋的群体、女权主义者群体、生态主义者群体等等。多元文化作为国家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一是来自于多民族、多族群的现实及其挑战，二是来自于其他持不同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文化群体。本文论及的多元文化现实以前者为主、兼论后者。

正如菲利克斯·格罗斯所言，“我们的地球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宗教和肤色的人们的栖息之地”，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文化多样的世界。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们结成共同体，通过群体生活和一起劳作，形成了共同的语词、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代代相授的集体记忆，进而发展出千差万别的文化群体。由于居住地、人种、语言、宗教的不同，在历史上，不同的群体之间也充满着摩擦和冲突。

但是，在西方政治的传统中，国家和制度的构建是以文化同质为基础的。无论是早期以整体主义为特征的城邦政治理论，还是J. S. 密尔断言的“政府的范围应大致和民族的范围一致”，都反映了西方政治传统中对同质性的追求。欧洲国家在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就是一个以主权民族国家为组成单位的体系，“对外领土身份被设定为应该对应的是内部身份的同质性”，近代民族国家以至高无上的、不可分割的主权为特征，试图“把所有的公民纳入到同质民族”之中、并推行统一的民族教育和政策等等，建立起一个现代宪政基础上的、以文化同质性、单一国族认同等为基本特征的“一致性帝国”；当然，也正是民族国家的确立，为西方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经济起飞做好了准备。由此可见，一方面，一致性和同质化体现了西方先发展国家进行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路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代化发展需要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无可否认的是，为了追求这种统一性，一些国家采取了排斥、强制同化、甚至种族

清洗的方式，这不仅成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不光彩的一面，也为国家间战争与国内族群冲突埋下了隐患。

由于人口的增长和交往的扩大，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可能的交集，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尤其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移民问题已经渐渐成为重要的政治议程。统计显示，“世界184个独立国家中共有600多个现存语言群体，有5000多个种族群体”，另外，“在国家内部，大规模的新移民社区也改变了城市和国家一度曾经由同宗、同源之人口组成的人口性质”。在当今世界，几乎已经很难找到纯粹的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金里卡认为，“今天，所有拥有原住民和附属于国家的民族群体的西方国家实际上都已经成为‘多民族’国家，他们承认‘各种居民’和‘各种民族’都是本国范围内的存在”，这些民族和居民拥有不同的语言、宗教、生活习俗，体现了不同的群体文化样态，多元文化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首先，多元文化带来了民主国家中的族群冲突与分离主义问题。事实上，由于绝大多数的国家并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主体民族和少数族群如何在一个由大多数人说了算的民主政治框架内平等共存，就成为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关于多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张力，中国学者马德普、柴宝勇的《多民族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张力》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他们认为，民主的“多数原则”与少数民族权利之间存在矛盾、民主的表达沟通机制与民族语言差异之间存在冲突、一体的民主政治与多元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张力。正是由于这种内在张力的存在，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就产生了分离主义者，有时候，他们以民族主义政党的形式进行分离活动，比如英国的苏格兰民族党、威尔士民族党等；另外，分裂与合作、冲突与和平的态势也往往在政党政治中有所反应，以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为例，目前北爱尔兰的主要政党有北爱统一党（UUP）、民主统一党（DUP）、社会民主工党（SDLP）、新芬党（SF）、北爱联合党（APNI）、进步统一党（PUP）、联合王国统一党（UKUP）等，北爱尔兰对和平的探索正是在复杂的政党谈判与博弈中进行的；而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魁北克党则是魁北克分离运动的领导，1994年魁北克党赢得了大选，并旋即在1995年提议公投，尽管公投失败，但由此可见，当分离主义与政党政治结合时，分裂也有可能以民主的方式进行。

其二，移民问题是多元文化提出的又一挑战。区别于一国有一定存在历史的少数族群，新移民群体一般没有分裂国家的诉求，而是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一方面，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的差异使他们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并且承受着来自于主流社会的种种歧视，而宪法对公民资格的种种规定也限制

了他们成为移入国的公民；另一方面，他们又在移入国居住、工作，对平等公民权利也有强烈的诉求。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冲突在政党政治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移民人数增加而带来的就业、居住、社会福利等问题，欧洲国家出现了极右翼的政党，传统的保守派政党大多也持反移民态度，而公众的反移民情绪往往会被一些政党所用，以增加选票。比如，德国的国家民主党就是极端的反移民政党，20世纪90年代，基民盟和基社盟也持排斥移民的政策主张，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则反对对移民的排斥态度，在移民问题上的政策主张也就成了政党联盟竞争中的主要议题。由于政党的政策倾向不同，少数族群的投票行为也存在偏好，在英国，大多数少数族群的选民倾向于给工党投票。另外，移民及其相关的政策对执政党也是一个考验，移民政策、移民的认同问题以及再分配政策等都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各国的反对党也往往在这些多元文化问题上做文章，对执政党提出质疑。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中，尤其是议会制国家，政府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下一次的选举。

其三，非主流文化群体给政党政治增添了新的内容。多元文化给各国展现出的图景是五彩斑斓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新社会运动，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反歧视同性恋者群体等作为政治力量活跃起来，这些非主流文化群体很大一部分由中间阶层的选民构成，而且通过社会运动这种形式表达诉求，也使其得到舆论和其他选民的关注，他们提出的议题也不同程度地成为选举中的内容，主要政党逐渐也无法忽视其要求。同时，非主流文化群体还以直接组建政党的形式参与议会选举，这无疑也影响了政党结构中的力量对比和结盟模式。比如，欧洲各国绿党的出现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政党政治。另外，在新社会运动、绿党等新兴政党的压力之下，传统政党的意识形态也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适应各种新的变化。

其四，后发展国家的情况更为复杂。在一些国家，移植了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竞争性政党体制，非原生的制度存在着脆弱性和很多弊端，在多元文化的情势下，前文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可能会以更尖锐、激烈的方式存在。在另一些国家，由于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需要，采取了一党制或一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它们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同样也面临上述问题。

多元文化的现实给政党政治增添了复杂性，也对政党的适应性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政党制度而言，新兴政党促使传统政党结构和政治联盟模式发生了变化；对于政党组织本身而言，需要思考如何在新的环境

中生存和保持活力；对于选举中的政党而言，考虑的是如何扩大选民基础及影响选民投票偏好；对于执政党而言，则是国家治理和政府政策的问题。

二、回应：当代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在19世纪以前，出于对宗派冲突与社会分裂的恐惧，政党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语词。随着观念和事实的变化，政党才逐渐地被接受，用萨托利的话来讲，“人们认识到多样性和歧见并不一定不见容于政治秩序或危害政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接受仍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信念体系之上的。政党虽然意味着充满分歧的“部分”，带有多元主义的色彩，但是，“部分”仍是整体的“部分”，政党的活动也是在遵守民主政治的规则和维持民族国家的统一之下进行的。同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政党内部也要求成员认同党纲、保持一致的行动。尤其在社会阶级分化明显的时期，政党意识形态的分野也很显著，就自身特点而言，表现为追求内部同质性的政党。后发展国家的政党更是肩负着民族解放、国家建构的重任，依靠政党的意识形态、纲领把人民凝聚起来，淡化差异而强调一致和团结。

从另一个角度讲，政党也将多样性引入政治制度之中，作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介，政党政治也为各种差异提供了达成共识的场域。随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多样性的发展，政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于是，政党就面临在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与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中如何取舍、平衡的问题。西方政党经历了从权贵党、大众党、全方位党、卡特尔党等组织形态的演变，这些调整都是在外部环境的“刺激——反应”和组织内部的“变化——调适”下发生的。面对多元文化的现实，政党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回应。由于政党是“参与选举，并且能够通过选举、提名候选人占据公共职位的任何政治集团”，选民、组织和政府被认为是政党政治的三张面孔，当代政党政治出现的新变化在这三个方面分别有所体现。

就选民而言，由于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大量中间阶层的选民，同时，选民关注的议题也不仅仅集中于经济政策领域，与多元文化问题相关的议题领域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关注。多元文化的现实使政党意识到，这些选民持有的选票并非可有可无。与此相适应的有两个显著的变化：其一，传统政党开始自我调整，以扩大其选民基础。政党政治不得不开始走出“不左即右”的政治循环，走向“第三条道路”，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价值包括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以及哲学上的保守主义等，反映并指引了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转向。尽管在这

一过程中，传统的左、右翼政党在对待多元文化问题上仍持有分歧的态度，左翼政党通常主张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施行宽松的移民政策、建设多元文化社会，右翼往往更多地关注普遍的个人权利、主张反移民政策等，但是一方面，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在关注多元文化问题，另一方面，两者在很多社会问题上的态度在向中间靠拢，尤其是右翼，对少数族群强制同化、反移民的极端态度开始慢慢松动。其二，新兴政党的支持率扩大，改变了传统的政党联盟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左翼和新右翼政党的支持者群体大多都是非主流文化群体，新兴政党中表现显著的是绿党，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欧洲各国绿党相继进入议会，1998年德国绿党成功与社会民主党组成联盟，并影响了德国政府在移民和公民权问题上的政策。其三，选举制度朝向比例代表制发展。迪韦尔热认为，相对多数选举制容易导向两党制，而比例代表制容易导致多党制。现实的情况从另一角度回馈了迪韦尔热提出的这条规律，多元文化促使了诸多小党的诞生，而一定的选民基础也支撑了这些小党的发展，同时对于一个多元社会的政府，也必须考虑比例代表的问题，因此也就从多个方面共同促进了比例代表制的趋向。英国是典型的采取相对多数选举制的国家，但是苏格兰、威尔士等地方议会选举中陆续引入了比例代表制，这种转向一方面是地方分权化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对多元文化现实的回应。

就政党组织本身来说，其一，选民结构、社会分歧以及议题的变化促使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做出反应，主要表现为在大选中竞选纲领渐趋淡化意识形态、有策略地使用议题并试图影响选民偏好，政党从某个阶级或特定集团的代言人转向尽可能涵盖更广泛群众的全方位政党。其二，从政党内部而言，体现了从追求同质性到追求共同性的转变。只有尽可能多地获得组织资源，才能够在变化了的环境中得以存续、保持活力。多元文化现实体现了价值选择多元化的趋向，如果政党仍然固守绝对同一的意识形态和集权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势必会流失更多的成员，因此，各国政党更多地表现出党内民主化的趋势。

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其一，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在处理族群问题上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等国家相继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奉为处理国内族际关系的官方政策，相对于之前采取的排斥、强制同化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更为温和，实质是一种柔性同化的方式，虽然这种政策仍然离不开自由主义的框架，但无疑是执政党为了扩大统治基础采取的策略，通过对差异的承认和包容，并在政策上尊重和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由于多元文化社会也需要一个共同的平台来调和种种分歧与冲突，执

政党也希望通过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来建构一个解决族群问题的框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近年来也备受诟病，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都分别表示过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失望，然而，不论这一政策是否成功，对于执政党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这是各国执政党执政方略变革的一个方向。其二，在后发展国家，多元文化给执政党带来更多的问题，当族群冲突与移植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相结合时，表现方式更为激烈、复杂程度更高。一些国家的执政党采取强制措施，有的暂时压制了冲突，却没能抵挡此起彼伏的分离运动。新加坡则是成功的例子，通过确立“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共同价值观，不仅使国内多族群得以和谐共存，同时也增加了人民行动党的统治资源、巩固了执政地位。

为了应对多元文化提出的挑战，各国政党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努力。这些举措和变化并不完全产生的是正面的效果，仍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政党意识形态的趋同，使选民往往觉得把选票投给哪一个政党都一样，由于选民政治热情的冷却、投票率下降，人们提出了疑问，政党衰落了吗？这使问题回到本文的标题上来，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党纲，也都各有其特色，有的政党在试图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丢掉了本党的旗帜，因此丢失了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变成了“无所适从的政党”；而有些政党为了坚守本党的特色与个性，日渐僵化，缺少灵活性和弹性，也因此而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如何在坚守政党旗帜与适应形势变化之间取得平衡，这就构成了当代政党变革面临的重大考验。

三、未来：个性与适应性的平衡

“多”与“一”、“差异”与“一致”的关系是政治学中的一个古老而弥新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在《政治学》一书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他提出了混合政体作为理想政体的制度设计，此种方案的核心涵义就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承认多元团体的不同需要并对其进行合理安置；中国古代的“中庸”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也是类似的思路，不过，后者更强调不同群体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归结起来，就是如何平衡的问题。平衡既可以是一种制度安排，又是一种政治策略。政党作为国内政治领域的重要行为单位，无论是在野、参选还是执政，也面临着在政党个性与适应性之间平衡的问题，这一方面关系到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到现代国家统治方式的变化。

政党政治有两个原初的目标或是功能，一是减少暴力，二是有效治理。从政党体制本身来看，其存在就

是民主政治的容纳异见、提供选择的场域。正如史蒂芬·E. 弗兰泽奇所言：“一直以来，政党就已将足够的冲突引入政治体制……在问题冲突的领域里，政党提供了一些最丰富的理由，来定义迟迟不决的政策问题，勾画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的方法”。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存在一个时序问题。最初民主制度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确立起来的，这一阶段由于国家建构和现代化发展对集中的力量的需要，一致性主导了政治生活，在此基础上生长出的政党也带有追求绝对同一的色彩，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价值选择，政党的个性非常鲜明。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无法再回避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多元文化在给民主政治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政党提出新的适应性问题。在这种情势下，当代政党政治产生了如前文所述的各种新变化，究其根本，这些变化体现了从追求同质性向追求共同性的转变，但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个性与适应性的问题，就容易是政党的竞争流于政治营销，各式推销手段之下的实质内容却乏善可陈，进而导致选民对政党的信任危机、对投票毫无兴趣、产生政治冷漠；以及党员数量减少、对政党的忠诚度降低、乃至政党政治的衰落。

在政治领域，“差异”和“共同”是同时存在、一起发展的，走向何方将由力量大的一边所决定。“多”可以是分裂的“多”，也可以是共存的“多”；“一”可以是“绝对同一”，也可以是“和谐统一”。在实现多元文化一体共存的过程中，政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党政治为共识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对话和整合的框架，政党在其个性与适应性平衡的过程实际上也同时在试图调和“一致”与“多样”之间的关系。那么，政党如何才能个性与适应性之间取得平衡？其一，既能坚守个性又有强适应性的政党需要持更具包容性的政党纲领，更具包容性的政党纲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扔掉政党的旗帜和个性，而是要求政党放弃唯我独尊的、封闭僵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建立一种包容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和政党文化。其二，既能坚持旗帜又包容多样的政党需要实现从追求同质性到追求共同性的转变。共同性并不等同于同质性，共同性体现的是在差异的“多”中通过协商、对话、吸纳、调和等来寻求最大程度的共识，在坚守个性的同时包容多样，能够形成共识的基础越厚，就能够占有越多的统治资源，尤其是对于执政党而言，就越有利于巩固其执政地位。一言以蔽之，在多元文化的现实之下，政党不可固步自封，要通过不断地重新审视自我、实现自我调整和更新，既要有原则性，也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方能得以存续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英]J. S. 密尔, 汪瑄译: 《代议制政府》,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 第223页。
- [2] [美]胡安·林茨等著, 孙龙等译: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30页。
- [3] 马德普、常士闾: 《多元文化存在的不可避免性与人类文化的繁荣》,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9年第5期。
- [4]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 王建娥、魏强译: 《公民与国家》,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年版, 第19页。
- [5] [英]J. S. 密尔, 汪瑄译: 《代议制政府》,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 第225页。
- [6] [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 《身份认同的困境》,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版, 第11页。
- [7] [以]耶尔·塔米尔, 陶东风译: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0页。
- [8] 参见[加]詹姆斯·塔利著、黄俊龙译: 《陌生的多样性: 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63-71页。
- [9] [加]威尔·金里卡, 杨立峰译: 《多元文化公民权——一种有关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年版, 第1页。
- [10]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 王建娥、魏强译: 《公民与国家》,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年版, 第19页。
- [11] [加]威尔·金里卡, 黄文前译: 《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 西方模式、全球趋势和亚洲争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6年第1期。
- [12] 马德普、柴宝勇: 《多民族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张力》, 《政治学研究》, 2005年第3期。
- [13] [意]乔万尼·萨托利, 王明进译: 《政党与政治体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第30页。
- [14] [意]乔万尼·萨托利, 王明进译: 《政党与政治体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第96页。
- [15] [英]安东尼·吉登斯, 郑戈译: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70页。
- [16] [美]史蒂芬·E. 弗兰泽奇, 李秀梅译: 《技术年代的政党》,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 第14页。

[阅读全文](#)

本站所收集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和刊物所有, 如果涉及版权问题, 请联系我们。

[\[关闭窗口\]](#)